



# 陶寺文化早期墓葬 M2172 的“东方文化因素”分析\*

高江涛

**摘要:**陶寺文化中存在多种区系的文化因素,这在陶寺文化墓葬及出土遗物中有明显体现。陶寺遗址墓地中的 M2172 在墓葬等级上虽是二类甲型,但墓圻却比一类大墓还略大。该墓葬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文化属性除了主体属于陶寺文化以外,还见有石家河文化因素。更为重要的是, M2172 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玉钺的形制、彩绘陶器的风格等体现着较多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东方文化因素”,不排除是部分人群迁徙至陶寺并参与其社会管理的可能性。陶寺文化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族群融合等状况,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包容性等特性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陶寺墓葬;随葬品;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6-0005-08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24.06.005

陶寺文化中存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陕高原的石峁文化、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等不同区系文化因素<sup>①</sup>,尤其是陶寺文化早期,可见有较多的来自东方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因素<sup>②</sup>。有一些学者指出陶寺出土的部分玉石钺具有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sup>③</sup>,甚至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及良渚文化的东方文化因素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sup>④</sup>。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多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陶寺文化中的多样性文化因素及东方文化因素,缺乏微观层面对某一墓葬的具体细致考察。陶寺遗址从 1978 年至 1985 年共发掘了 1309 座墓葬,其中 M2172 在规格上虽属于二类甲型墓葬,但其墓圻却堪比一类甲型大墓,甚至还略大,且在埋葬形态与随葬品方面也有诸多特殊之处。本文拟从 M2172 随葬猪下颌骨现象、玉器特征、彩绘陶器等方面对相关

问题作深入分析。

## 一、特殊葬俗中的“东方文化因素”

陶寺遗址 M2172 有以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这一葬俗比较奇特,并非晋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可能受到东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该墓为竖穴土坑墓,墓口长 3.3 米、宽 2.89 米、存深 1.88 米,规模与大型墓葬相当。墓葬设有二层台,二层台的台面头端宽 0.44 米,左右两侧及足端宽 0.56 米<sup>⑤</sup>。在相对宽阔的二层台上残存有 5 组 58 副猪下颌骨,十分显眼与突出。该墓室西北角及其二层台被破坏掉,此处二层台上原置的猪下颌骨也被毁尽(图 1)。按照对称摆放的原则,实际上原有数应该在百副以上。这种随葬猪下颌骨的特殊葬俗,目前在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仅见于陶寺遗址中。从陶寺墓地早期墓葬看,随葬猪下颌骨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等级。用猪下颌骨随葬不仅仅是为

收稿日期:2024-03-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报告(2012—2021)”(22&ZD242)。

作者简介:高江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10),主要从事先秦考古研究。

了墓主死后的肉食,数量众多者是助葬之物,很可能是送葬人在葬仪中以此表达与墓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家族世系<sup>⑥</sup>。但晋南地区仰韶时代至龙山早期向无以猪性随葬的习俗<sup>⑦</sup>,此种葬俗应来自陶寺文化以外的其他史前区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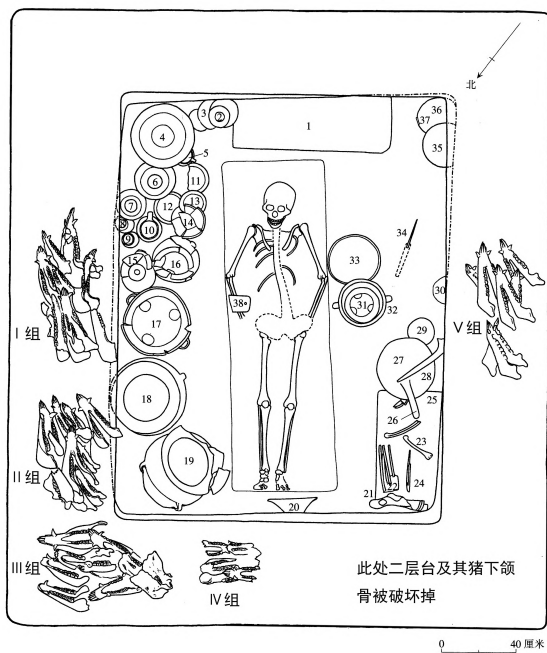


图1 M2172平面图及其随葬猪下颌骨

与陶寺文化早期相当及略早的史前区域文化中,盛行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的主要有汉水流域的石家河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sup>⑧</sup>。此外,在郑州大河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M91人骨头部见有一块猪下颌骨<sup>⑨</sup>,该墓葬实际上是灰坑底部的埋人,属于非正常死亡埋葬,猪下颌骨很难断定专为该死者随葬,也很可能属于灰坑中的丢弃物。同属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以外与之大体同时期的清凉寺墓地M76有一例猪骨随葬。罗运兵敏锐地观察到这例雄猪下颌骨属于野猪,且其第三臼齿后增生有畸形齿,相当罕见,推测这件下颌很可能是死者生前的猎获品,因其特异,所以葬入。因此,这例猪骨随葬与陶寺常见的家猪下颌骨随葬显然不同<sup>⑩</sup>。晋南周边地区晋陕高原石峁文化的寨山遗址庙塆地点墓地中有些墓葬壁龛内放置有猪下颌骨,多者10件,少者1件<sup>⑪</sup>。寨山遗址庙塆地点墓葬有关年代的材料并未公布,但居址材料已经发表,简报撰写者认为居址属于石峁文化中期阶段,绝对年代大

约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sup>⑫</sup>。简报中言及墓葬是打破居址的,因此墓葬年代还应晚于居址。而陶寺墓地随葬猪下颌骨的M2172等墓葬的测年数据,发掘报告推断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00年<sup>⑬</sup>,且M2172也不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墓葬,陶寺墓地最早墓葬的年代在距今4400年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可见,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寨山遗址墓地年代,寨山遗址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很可能源于陶寺文化。总之,陶寺文化早期,其周边地区罕见随葬猪下颌骨现象,而且晋南地区仰韶时代至龙山早期向无以猪性随葬的习俗。可以肯定陶寺文化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源于其他远距离的史前区域文化,那么是前述齐家文化、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的哪一个呢?或是兼而有之呢?罗运兵将陶寺文化墓葬中包括猪下颌骨在内的各类葬猪现象,与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葬猪现象进行了详细地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存在较多相似之处,陶寺墓地葬猪习俗传自海岱地区的可能性较大<sup>⑭</sup>。而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区和汉水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区,罗运兵并未提及,我们不能忽略这两者,需要进一步探索。

黄河上游地区在距今5500年至4500年间,有少数遗址中存在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大体到距今4500年至3800年之间,这一葬俗开始盛行,在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临潭磨沟遗址等墓葬中,出现随葬大量猪下颌骨的现象<sup>⑮</sup>。进一步分析这些随葬猪下颌骨墓葬的年代可知,大何庄、秦魏家、皇娘娘台等遗址中随葬猪下颌骨的墓葬均属于齐家文化第三期<sup>⑯</sup>,即齐家文化晚期。近年来新发现的磨沟墓地的年代上限接近或略晚于秦魏家上层墓葬的年代<sup>⑰</sup>,也就是说其最早年代属于张忠培所划分的齐家文化分期的第三期,绝对年代最早能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由于材料的原因,测年数据相对较少,更是缺乏系列测年数据,一般认为其年代数据集中于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也有一些数据显示其上限早至公元前2300年左右<sup>⑱</sup>,如喇家遗址,叶茂林认为该遗址属于齐家文化的中、晚期阶段<sup>⑲</sup>。因此,无论如何,齐家文化的晚期阶段都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100年。可见,

黄河上游齐家文化中盛行的猪下颌骨随葬习俗是明显晚于陶寺文化早期的,陶寺文化早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源于黄河上游地区的可能性应可以排除了。此外,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的猪下颌骨多是置于墓口填土中,即使在墓室中的也是零散或随意堆放在一起,罕见如陶寺墓中那样整齐有意排放,其埋葬特征完全不同,这更说明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对于汉水流域史前时期墓葬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的演变,学者们虽有不同分期的论述<sup>②</sup>,但就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为该习俗的废弃阶段这一认识则是一致的。此时,不仅随葬猪下颌骨的墓葬数量急剧减少,墓葬中的猪下颌骨也是零星随葬,而且随葬猪下颌骨的墓葬更是罕见较高等级者,似与地位或财富已无关联。而海岱地区龙山时代随葬猪下颌骨的遗址数量虽然没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多,但仍然有较多遗址中存在这一葬俗,依旧比较流行,甚至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如泗水尹家城遗址墓葬中随葬数量不减反而大增<sup>③</sup>。总之,随葬猪下颌骨这种习俗在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中已经衰落,其能否远距离影响大体同时代的陶寺文化值得怀疑;相较而言,陶寺文化早期墓葬随葬猪下颌骨习俗最有可能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 二、随葬玉钺的东方表征

陶寺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玉石钺,发掘者依据形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sup>④</sup>,实际上整体而言是两大类:一类是窄体,即器长明显大于器宽,器体或为窄长方形或为窄梯形;另一类是宽体,即器宽大于器长或接近器长,呈横长方形或近正方形。一般而言,陶寺文化早期玉钺的风格尤其是双孔形制,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及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石钺有着密切关系<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窄体还是宽体,陶寺玉石钺中有着数量不少的弧刃,其中宽体弧刃钺,也就是所谓的近“风”字形钺发现多例。

“风”字形钺是江淮之间和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流行的玉器种类,尤其是良渚文化,此类玉钺为大型墓葬如反山与瑶山所常见<sup>⑥</sup>。在海岱

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发现有这类玉石钺,如王因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的 M160:1、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的 M12:6 以及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玉钺 M57:5 等<sup>⑦</sup>。陶寺 M2172 的贴身玉钺虽然在发掘报告中没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但从墓葬统计表和墓葬随葬器物平面图可以明显看出其正是“风”字形玉钺(图 2)。该玉钺为蛇纹岩,呈灰绿色,间有白色晶体,长 11.65 厘米、宽 9.9—10.65 厘米、厚 0.95 厘米,单孔,孔内及孔上缘两面见有红彩<sup>⑧</sup>,当是涂彩木柄遗留的痕迹。

此外,陶寺文化分布区域以外的中条山南麓芮城清凉寺墓地 M79:10 为一件近“风”字形玉钺,只是弧刃略斜。清凉寺墓地出土有数量较多的玉器,在器类和形制上与陶寺遗址墓地出土的玉石器有诸多相同之处,同属于晋南体系,但二者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如清凉寺玉石钺罕见双孔,仅见 M79 与 M82 中出土的两例,也就是说 M79 出土的这件玉钺恰恰是清凉寺墓地常见玉石钺中的“异类”品。清凉寺墓地第二至四期测年数据在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之间,大体与陶寺文化年代相当, M79 属于其第二期,与陶寺文化早期大体相当。因此, M79 出土的这件玉钺有可能是该地文化与陶寺早期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结果。需要提及的是,在河南伊川伊阙城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石铲” M9:5,器体扁薄,有孔,双面刃而非单面刃<sup>⑨</sup>,应是石钺。从器形看,刃部较宽且为弧刃,明显是近“风”字形钺。此外,包括 M9 在内的伊阙城遗址发现的 5 座墓葬也都带有熟土二层台,这样 M9 在二层台和近“风”字形玉石钺两个方面均与陶寺 M2172 有相近的地方,即使如此也很难据此断定二者之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毕竟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陶寺文化之间并非前后相继,而是存在几百年的时间差。

伊阙城 M9:5 出土于有棺有椁有二层台的棺内,棺内人骨之上及近处的随葬品还有 3 件石斧和 1 件玉饰。瑶山 M7 不仅出土有玉钺,还出土形制相近的石钺,而且玉钺与墓葬随葬的其他 157 件(组)玉器、嵌玉漆器、石器、陶器和动物牙齿被较为集中地放置在人骨之上及其近处。同样,反山 M14 中的 3 件(套)玉钺和 16 件石钺以





图2 陶寺、焦家、反山、瑶山、清凉寺、大汶口、王因、伊阙城“风”字形玉石钺

及其他较多数量的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人骨之上及其近处周边。焦家 M57 为一棺一椁带有二层台的较大型墓葬，发现随葬品 51 件，其中“风”字形玉钺 M57:5 和另外 1 件玉钺 M57:4 分别位于墓主盆骨和股骨交界处的左右两侧，它们与其他镯、指环、管和坠等 7 件玉器都是墓主人随身佩戴之物。值得注意的是，棺内的 5 件陶器应该是随着葬具腐朽塌陷，从二层台滑落至棺内的。

从目前材料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是“风”字形玉钺出土相对较早的区域。陶寺 M2172 发现的此类玉钺与当地器物无直接渊源，而晋南周边区域大体同时期的玉钺更可能是由陶寺传入的。陶寺这类玉钺有明显的东方良渚文化因素或者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最有可能来源于东方地区或受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 三、彩绘陶器中的“东方文化元素”

陶寺 M2172 除了随葬猪下颌骨以及特殊的玉钺外，还随葬有大量的彩绘陶器，其彩绘陶器 12 件，占 20 件随葬陶器一半以上。其他二类甲型墓如 M2103、M2168、M2180、M2035 等随葬品保存完整者彩绘陶均占随葬陶器一半以上。M2172 这一类墓葬墓主对彩绘陶的“钟爱”可见

一斑。M2172 彩绘陶器上的纹饰主要分为三类，即圆点纹、条带纹和曲折形几何勾连纹。圆点纹、条带纹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的同类纹饰几乎一样，这基本是学界的共识<sup>⑧</sup>，而且两地这类纹饰装饰在陶器上口沿、肩部和足底缘的位置也一致。此外，组合纹饰也有基本相同的，陶寺大型墓中彩绘陶壶如 M2001:4、M3002:50、M3015:41 等肩部由圆点、波纹以及卷云纹结合形成的组合纹饰<sup>⑨</sup>与近年新发掘的焦家遗址大型墓 M57:38 陶背壶肩部的彩绘纹饰<sup>⑩</sup>十分相近(图 3)。M2172:4 折腹盆的“曲折形几何勾连纹”，绘制精细，图案复杂(图 3)，李新伟认为其构图表现的是鸟纹，鸟纹构图更多应是吸收了良渚文化的理念，继承了神鸟崇拜的观念和意识<sup>⑪</sup>。这种彩绘纹饰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何线条的曲折与勾连，尽管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中有一些折线、回纹<sup>⑫</sup>，甚至小河沿文化晚期也存在回形几何纹<sup>⑬</sup>，但这些区域文化与陶寺文化在年代上有较大差距，而大汶口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早期的彩绘陶却罕见线条类几何勾连图案<sup>⑭</sup>。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虽然陶寺彩绘陶这种曲折形几何勾连纹可能有着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或良渚文化的因素、文化理念，但也仅仅是因素与理念的可能性吸收，这种复杂勾连且成组环带状的彩绘纹饰应是陶寺文化先民自己创新出来的独特图案。



图3 陶寺与焦家组合纹饰及陶寺曲折形几何勾连纹

一般认为海岱地区的史前彩陶从北辛文化开始出现,约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进入鼎盛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逐渐走向衰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不多见<sup>⑤</sup>。但海岱地区的彩绘陶器,在彩陶由繁盛转向衰落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才开始萌芽,在彩陶衰落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得到长足发展<sup>⑥</sup>,故彩绘陶器很可能是作为彩陶的仿制或替代品兴起的<sup>⑦</sup>。彩绘陶在海岱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早期时就很快消失了,却在大体同时的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兴盛起来。

因此,陶寺 M2172 一类墓葬中的彩绘陶器很可能受到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吸收了其文化因素或理念。然而,需要强调以下三点:第一, M2172 墓葬中有与之大体同时以及略早的东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但并非只有东方文化因素,还有其他如南方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因素<sup>⑧</sup>,只是东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相对多一些。第二,陶寺文化与其代表的社会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大多不是进行简单吸收式的“拿来”或“复制性效仿”,而是有所扬弃,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或创新。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与彩绘陶,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sup>⑨</sup>。第三,陶寺文化中存在明显的“东方文化

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它就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sup>⑩</sup>,这种“文化的移动”背后是否是人群的迁徙流动难以断定。虽然这很可能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sup>⑪</sup>的结果,但陶寺墓葬中这种大量的或过多的“东方文化因素”,不能排除部分东方族群迁入,并参与陶寺社会礼制建构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

#### 四、尧舜时代的“族群变迁”

史载夏代之前有“尧舜禹”,但“尧舜禹”和“尧舜禹时代”是两个有联系但不相同的概念。“尧舜禹”不一定可以一一据实,但以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期”或“时代”是肯定存在的,甚至还存在更早一些的“仰韶时代”。就古史传承和考古实践而言,尧舜禹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至于给这个时代加上一个什么样的“符号”,贴上什么标签,是结合古代文献而赋予的“标签”,还是不结合文献的“新命名”,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讨论的,但这个时代存在的真实性是确定的。陶寺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尧或尧舜那个时代的都邑,其所在的临汾盆地与文献中的陶唐氏、唐地密切相关。

先秦文献中常见陶唐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自述家世时说：“昔勾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sup>[1]4296</sup>《国语·晋语八》有基本一样的记载<sup>②</sup>。即虞舜之前为陶唐氏，其后裔三代时期一直延续发展。夏代有陶唐族、唐人的传说与记载。《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sup>[1]4695</sup>《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正义》曰：“谓之唐人当是陶唐之后。”<sup>[1]4393</sup>

甲骨卜辞中有唐地或唐国的记载。“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合集》<sup>③</sup>14200正）“唐人三。”（《合集》9269）“贞使人往于唐。”（《合集》5544）学者认为此处的唐地或说唐国与陶唐氏有关，具体地望当在大邑商之西<sup>④</sup>。张铨在《“唐地”考辨》一文中，考证了豕韦氏的聚居地与陶唐氏的文化类型，认为“豫北地区在豕韦氏之前应原为陶唐氏居地，陶唐氏所使用的文化即为后岗二期文化”<sup>[2]</sup>。

西周时晋南一带作为夏墟，称唐地开始见于文献。《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晋国的分封：“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sup>[1]4637</sup>周初封叔虞于夏墟的唐地，为今晋南之地几无疑问，更具体指向河汾东百里之地。颡公簋铭文载：“颡公作妻姚簋，遣于王令易（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五。”<sup>[3]</sup>易即唐，甚至唐为殷墟卜辞中，受祭之先王“汤”<sup>[4]</sup>。清华简《汤处于唐丘》开篇言：“汤处于汤（唐）丘，娶妻于有莘。”“汤丘读为唐丘，地名，疑即殷墟卜辞的唐土。”<sup>[5]</sup>沈建华也大体认为易、唐、汤为一，楚简言“居于唐丘”，正说明商汤“从先王居”，始源于唐丘封地的晋南一带<sup>⑤</sup>。

杨宽认为古史传说中的颡项为高阳氏，帝尧为陶唐氏，“陶”与“高”音近，“唐”与“阳（易）”古声通用，故陶唐氏乃高阳氏之音转，颡项与帝尧为一帝之分化<sup>⑥</sup>。颡项与帝尧是否为一帝可以讨论，“唐”与“易”相通似为确。值得注意的是，颡公簋铭文中的“易（唐）”和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的两个“文字”中的“易”在字形上

基本一致<sup>⑦</sup>（图4）。可见，易或即为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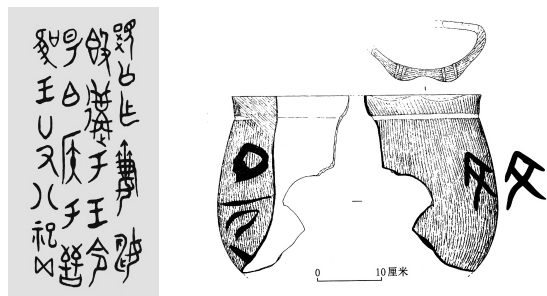


图4 颡公簋铭文与陶寺朱书扁壶中的“易”字

《左传》《国语》等较早时期的先秦文献中未见明显将帝尧与陶唐氏直接对应的记载，秦汉以后，帝尧为陶唐氏的记载出现较多，这一说法逐渐盛行。《史记·五帝本纪》言：“帝誉娶陈锋氏女，生放勋。……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sup>[6]14-15</sup>

文献中还有一些有关尧舜时期相关族群变迁的记载。尧族群的聚居地除了多见的唐地之外，还见有“陶丘”的说法。《说文解字》云：“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sup>[7]</sup>《后汉书·郡国志》载古帝尧所居陶地为济阴郡定陶县<sup>[8]</sup>，位于今山东省菏泽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sup>[6]31</sup>鄄城也属于今菏泽地区。关于唐地除上文所见“晋南说”外，还有“唐县说”。《帝王世纪》主张唐地即中山国唐县<sup>[9]</sup>。《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也言及尧为唐侯在定州唐县<sup>[6]15</sup>。以至一些学者认为帝尧陶唐氏存在从河北唐县一带迁徙至晋南的情况<sup>⑧</sup>。近些年有学者甚至勾勒出了尧较为清晰的迁徙路线，认为尧早年主要活动在今豫东北和冀中南一带，后来又迁居晋中太原盆地，最后沿汾河谷地南下在今临汾盆地定都<sup>⑨</sup>。舜的活动地域文献中同样存在多种说法，如出生于姚丘、诸冯，耕历山、鱼雷泽、陶河滨等。魏继印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一步推测舜早期生活在鲁西、豫东北一带，然后经郑州、洛阳迁到豫西、晋南一带，最后北上在陶寺登上帝位<sup>⑩</sup>。

通过对上述文献材料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陶唐氏应该是一个古老的族群，至少可以早至史前的龙山时代。第二，这个族群存在明显的发展变化，夏、商、周不同时期均有零



星但较为明确的延续记述,秦汉之后被更多的文献记载,并与帝尧有了直接关联。第三,这个族群很可能存在着迁徙与融合,涉及广域上的海岱地区、太行山东麓、晋南等重要区域。我们分析了陶寺墓地中以 M2172 为代表的少部分墓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虽然这并不能十分肯定或者完全对应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但陶寺文化与海岱及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或相继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是可以肯定的。鉴于此,我们适当地推测文献中有关尧或尧舜族群的发展变迁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文化互动交流。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中以较高等级墓葬 M2172 为代表的陶寺文化早期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最有可能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M2172 出土的“风”字形玉钺,无当地的直接渊源,反而具有东方良渚文化或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陶寺周边区域大体同时期的此类玉钺更可能是由陶寺传入。M2172 这类墓葬中部分陶器的彩绘纹饰同样受到东方的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包含其文化因素或理念,但经过陶寺社会的改造而有所创新。陶寺文化中这些大量的“东方文化因素”,体现出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甚或反映的是部分人群迁徙至陶寺并参与其社会管理的史实。陶寺文化海纳百川,积极吸纳周边区域的文化因素,并且这种吸收融合并非只是简单的“复制性仿效”,而是融入自己的特色进行相当程度的创新,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的重要体现,也为陶寺遗址成为同时期的区域文明核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 注释

①高江涛:《从百年考古学看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光明日报》2021年12月6日。②⑤⑬⑭⑲⑳㉑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3—1095页,第467—469页,第1114—1115页,第674—790页,第680页,第1092—1097页,第588—590页。③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37页;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2010年第3期。④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⑥夏宏茹、高江涛:《试析陶寺墓地随葬猪下颌骨现象》,《中原文物》

2022年第5期。⑦同属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以外与之大体同时期的清凉寺墓地 M76 有一例猪下颌骨随葬,很可能是死者生前猎获野猪,因其特异,所以葬入,其与陶寺常见的家猪下颌骨随葬显然不同。参见罗运兵:《陶寺墓地葬猪现象及其习俗来源》,载《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161页。⑧孙丹:《略论史前时期黄、淮河流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考古》2017年第10期;孙丹:《试论史前时期长江流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东南文化》2018年第3期。文中孙丹把距今4500—3800年作为一阶段予以专论,而该阶段的开始年代恰是本文所言的陶寺文化早期与略早时期。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413页。⑩⑪罗运兵:《陶寺墓地葬猪现象及其习俗来源》。⑫李瑞:《五项考古新成果揭示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中国文物报》2020年9月25日。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西谷寨山遗址庙塬地点居址发掘简报》,《文博》2021年第5期。⑭所述几个遗址墓葬随葬猪下颌骨情况参见孙丹的文章,不再一一注释。孙丹:《略论史前时期黄、淮河流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⑮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与第2期。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钱耀鹏、毛瑞林:《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及主要收获》,《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654页。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九)》,《考古》2003年第7期;《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考古》2005年第7期。⑱叶茂林:《喇家遗址绝对年代的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⑲曾宗龙:《试论汉水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猪骨随葬现象——兼说与黄河流域同类葬俗的关系》,载《长江文明》第11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8页;孙丹:《试论史前时期长江流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⑳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㉑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杨小博、赵国靖、王青:《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综述》,载杜金鹏主编:《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3页。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山东省文物管理

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35—36页;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⑳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南伊川县伊阙城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㉑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㉒李新伟:《陶寺墓地彩绘陶器上的鸟纹》,《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4期。㉓栾丰实:《海岱地区彩陶艺术初探》,载《栾丰实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990—999页。㉔赵宾福、任瑞波:《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㉕㉖李宗山:《海岱地区史前彩陶与彩绘陶初论》,《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㉗李宗山:《海岱地区史前彩陶与彩绘陶初论》,《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另参见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陶器的精华——彩陶、黑陶和白陶》,载《栾丰实考古文集》,第977—980页。㉘王天艺:《从彩绘陶器看陶寺文化的丧葬与社会》,《考古学集刊》第24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118页。㉙M2712出土的木觚显然与居址中的陶觚形制基本相同(见《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75页),这类“粗体觚”应源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所常见的斜腹杯。㉚高江涛:《陶寺文化与社会三个特质》,《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㉛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㉜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㉝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3页。㉞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为《合集》,所引卜辞皆

标注甲骨编号,不再另注页码。㉟张永山:《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㊱沈建华:《楚简“唐丘”与晋南夏商遗迹考》,《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06—214页。㊲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184页。㊳关于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字”:一个是与甲骨文“文”字相似的朱书“字符”;另一个多被认为是“易”或“尧”。参见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笔者倾向于“易”,易或为唐,意指陶唐,亦与尧有密切关系。㊴何光岳:《陶唐氏和唐国的迁徙》,《河北学刊》1986年第2期。㊵魏继印:《尧的起源与迁徙》,《兰台世界》2011年第17期。㊶魏继印:《舜族的起源与迁徙》,《海岱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 参考文献

- [1]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张钰.“唐地”考辨[J].中原文化,2003(1):20.
- [3]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88.
- [4]朱凤瀚.观公簋与唐伯侯于晋[J].考古,2007(3):64-69.
- [5]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M].上海:中西书局,2015:135.
-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278.
-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456.
- [9]皇甫谧.帝王世纪[M].陆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15.

## Analysis of “Oriental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Early Tomb M2172 of Taosi Culture

Gao Jiangtao

**Abstract:** Taosi culture exhibits various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which are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ombs and unearthed relics. Although M2172 in the Taosi Cemetery is classified as a Type 2 A tomb, the tomb mound i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ype 1 tomb, and features several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cultural nature of this tomb belongs to the Taosi culture, and there are also elements of the Shijiahe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 customs of burying pig mandibles, the shape of jade axes, and the style of painted pottery in the M2172 reflect many “Oriental cultural factors” of Liangzhu culture and Dawenkou-Longshan culture. Therefore, it cannot be ruled out that some people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might have migrated to Taosi and participated in its social management. Taosi culture reflects its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areas, and highlights the innovative and in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aosi tombs; funerary objects; cultural factors

[责任编辑/知 然]